

寻觅古运河上的文化帆影

古人开挖运河,最初主要用于运送兵力的军事目的。后来,运河的经济价值开始跃升,粮食和其他物资成为运河运输的主要货物。宋人张方平就说,“今日之势,国依兵而立,兵以食为命,食以漕运为本,漕运以河渠为主。”实际上,作为古代中国的交通大动脉,大运河上文化的南来北往从未停止过。在明清时期,随着江南经济与文化的发展,大运河的文化线路意义也变得更加重要。

在此,撷取明清两朝无锡的三则故事,寻觅古运河上的文化帆影。

| 陆阳文 |

安国北上： 传播活字印刷术

安国,明代中后期无锡人氏,“性资警敏,多谋韬略”,在商业活动中屡算屡中,积得巨货,人称“安百万”。无锡流传有“安国、邹望、华麟祥,日日金银用斗量”的歌谣。

安国家货富饶后,因酷爱桂花,在家乡后山遍植丛桂,自题住所为“桂坡馆”,人称安国为“桂坡公”。《无锡县志》载:“安国,字民泰,富几敌国。居胶山,因山治圃,植丛桂于后冈,延袤二里余,因自号桂坡。……又西林胶山,安氏园也。嘉靖中,安桂坡穿池广数百亩,中为二山,以拟金、焦。至国孙绍芳,即故业大加丹雘,与天下名士游赏其中,二百年东南一名区也。”

同时,安国“好古书画彝鼎,购异书”。他铸造活字铜版,以“桂坡馆”的名义刊印图书。他印书校勘之精细,质量之优等,受到世人的高度评价。明代俞安泰在安国所印的《初学记》跋中说:“安氏经、史、子、集活字印行,以惠后学,二十年来,无虑数千卷。”清初安璠在《安氏家乘拾遗》中说:“翁(指安国)闲居时,每访古书中少刻本者,悉以铜字翻印,故名知海内。今藏书家往往有胶山安氏刊行者,皆铜字所刷也。”钱谦益说:“金陵本为舛,得锡山安氏活字本校改数百家,深以为快。”这就是安氏印本深得藏家重视的明证。清代学者叶昌炽在《藏书纪事诗》中高度赞颂安国的业绩:“胶山楼观甲天下,曲桥华薄荡为烟。徒闻海内珍遗策,得一珠船价廿千。”

安国进行铜活字印书,大致始于明武宗正德七年(1512)。也正是这一年,南京吏部尚书廖纪托他代印自己所修的《东光县志》六卷,九年后的1521年告竣。这一年,安国放舟北上,船中叠放着一摞摞簇新的《东光县志》。

安国此次进京的路线是:沿运河一路北上,在山东登岸游泰山,接着继续舟行,过歌风台,经临清抵天津,随即入京,拜谒了廖纪,送上《东光县志》。

廖纪在《送锡山安民泰北游南归序》提及安国为人,追忆了曾经与安国的交往。“君名国,字民泰,别号桂坡。居家孝友,处乡和睦,交友忠信。延师教子,以讲明道义。轻财好义,以延接四方贤士大夫。多积古经书子史若干卷,闻人有奇书,必重价购之。复置活字铜板,印行以传四方。时饥疫,出粟若干石、银若干两以赈济之,又推其余粟数千石以周乡之贫乏者,未尝取息。其为人制行多类此。余昔承乏南吏部,闻其家有活字板,托印邑志,书成送予”。安国在《安桂坡游记·东游稿》中较为详细地谈到此事:“予好游。虽历览吴浙名胜,而大观则未也。金台为我朝建都重地,观光之兴,未由率举。正德辛巳,南天脚龙湾廖公闻予家有



古籍中的古运河无锡段示意图

活字板,间以《东光县志》托予翻印,斯文礼通,遂成深契。越甲申,圣天子知公之才,起掌铨衡,居北署。乙酉之春,走使期会。……龙湾又称吏侍温、孟、李三公,均有好古之雅,引为荆谿,果辱优礼。”

安国与廖纪的交往,成就了印刷史、文化史上的一段佳话。大运河为他们的交往提供了便利,所印《东光县志》是我国最早也是唯一用铜活字印的地方志,也是运河沿岸的剧县(政务繁忙的县)县志。

愚公南下： 西湖的一场昆曲盛宴

万历三十六年(1608),时年六十岁的邹迪光率家班沿运河放舟。晚明时期,无锡是苏州周边昆曲最为兴盛的地区之一。文人雅士痴迷于昆曲,他们兴办家班,组织演出,极大地活跃了昆曲舞台。在这批文人中,邹迪光及他置备的家班尤为引人注目。

邹迪光,字彦吉,无锡人,出身官宦之家,大明万历甲戌(1574)进士,官至湖广提学副使。万历十七年,邹迪光罢归,在惠山下筑愚公谷,自称愚公。邹家班在当时的戏曲界十分有名。王永积《锡山景物略》载:“愚公谷即海内所传邹园是也。……梨园两部,尤冠绝江南。”从有关记载来看,这两部梨园应该是男班与女班各一。《锡金识小录》载:“(邹迪光)无一事不求其至者,妖姬美妾充轳”,“优童数十,极一时之选”。杭州张岱谈自家声伎时说:“我家声伎,前世无之,自大父于万历年间与范长白、邹愚公、黄贞父、包涵所诸先生讲究此道,遂破天荒为之。”史玄《旧京遗事》载:“常州无锡邹氏梨园,二十年旧有名吴下。主人亡后,子弟星散,今田皇亲家伶生净,犹是锡山老国工也。”

运河交通便利,明代各地家班得以沿运河往来于扬州、无锡、苏州、南京、杭州等城市之间游动演出,乃至乡野村间,也流行起了昆曲。这次邹迪光率家班沿运河南下,一路行至杭州城外的北新关,等候报关通行。河流设卡之所,便是人流汇集之地。邹迪光已是戏瘾难耐,令家班的伶人吟唱昆曲,旁若无人般欣赏起来。邹迪光《调象庵集》卷十八有《舟过北关,令家童控管度



运河老照片

曲,两涯间皆出视,次若抚兄韵”诗:“霞幢云翼拥回波,杨柳丝丝曳棹过。宝瑟半弹《别鹤操》,玉童齐唱《懊农歌》。麝兰香焰浮赭鲤,麈尾谈高出翠蛾。书在关门腾气紫,谁来乞得五千多。”《别鹤操》,乐府琴曲,此处意在表达漂泊水上的离别情绪。《懊农歌》,即南朝时期的吴声民歌。此处当非写实,即当时玉童齐唱的非民歌,而是借以指代用吴地声腔唱曲,即昆山腔(昆曲)。

几天后,邹迪光船至西湖,又是一番戏曲盛宴,引得行人驻足围观。《调象庵集》卷十八有诗记:《秋日尚热,西湖舟中命侍儿作剧,人来聚观,至夜分散……》。同书卷三十《西湖游记》载:“余命童子衍新剧,至二鼓罢去,居人游客驾小舟聚观,以数十计。每奏一技,赞叹四起,欢声如沸。”

邹迪光是极求“雅”之人。同时代的潘之恒《鸾啸小品·原近》记:“(邹)授法曲师,务律齐而矩列。画地以趋,数黍以剂。登场者惴惴,惟逸之是虞。”邹本人也曾十分得意地说:“余家歌调实求之于雅,一切金银假面,诨语俚语都所不用。人知其妙而未必真知所以妙也。”此次南行,时时求“雅”的邹迪光,意气之风发,风雅之张扬,跃然纸上,颇有魏晋风度。这是个性使然。无怪乎钱谦益评价“愚公亡,而江左风流尽矣!”站在西湖边上回想这段故事,便不难想象当年邹家班吟唱昆曲的情状是何等之“风流”。在喧闹的市井间,升腾起超凡脱俗的雅乐。那道靓丽而独特的风景,不必追问那一刻人们听了是否久久难忘,纵然放在今朝,恐怕也是要让人念想三日。

北塘香灯： “他邑未有也”

农历二月十五前后,春意萌动,柳叶吐翠,正是游春踏青的好季节。家住小娄巷的秦琦约上三两好友,驾上一叶小舟,早早去往惠山赏春游玩。

这一天,他们在惠山脚下的龙头浜登岸,到惠山寺进香,在二泉品茶,还赏玩了当地特产泥人,兴趣盎然。夜幕初上,他们又登上小舟,前往黄埠墩。那里有一场香灯盛会在等着他们。

明代前期,成祖夺得天下后,自

诩受北方真武帝君佑护,于是在真武道场武当山兴修道观,祀奉香火。自此,武当香火盛极一时,各地纷纷附和,每年进香人流蔚为壮观。江南松江府、苏州府和常州府一带信道者,纷纷雇佣适合长距离航行的艨艟巨舰,每二三十人一艘,汇集或百十艘乃至数百艘的进香船队,沿运河行进,经镇江进入长江,一路向西直达武汉,再入汉水进抵均州,登岸上山。大运河无锡段北塘一带水域十分宽阔,且四通八达,十里八乡而来的香船会约定俗成在此汇集过夜,并由此形成了独特的文化景观——北塘香灯。无锡为此流传这样的民谣:“二月半来采茶看,北塘沿河香灯闹。”这一习俗,一直沿袭至清中期以后才渐渐衰微,民国以后则完全湮没了。

每到此时,北塘热闹非凡。香船依次泊定,入夜之时就在桅杆顶上悬起香灯,船上有多少香客就要点多少灯。这些灯从桅杆垂下,一盏接一盏,如贯珠,似流星。灯光映入水中,河中又出现串串灯影,灯灯倒映,枝枝朵朵,水上水下融成一体。

香船之数以百计,看香灯船的船更多,常以千数。这些香船来时,以鸣锣为号声。无锡百姓听到锣声,纷纷从四面八方来到北塘运河边去观看香船。普通百姓挤满北塘码头,士人富商则纷纷乘坐载满歌伎的看船赶来,边饮边观赏。看灯船同样挂满灯笼,不过与香船不同的是,看灯船的灯并不悬于桅杆之上,而是悬于船窗口。香船的灯往往是纸灯,而看灯船的灯则花样众多,除了纸灯,还有各色纱灯、绢灯、水晶灯、羊角灯。香船上,阵阵木鱼声响,而看灯船上传出的是歌声、笑声、箫鼓声、丝弦管竹声。两相应和,恍若天上仙境,人间胜会。一时,“人烟如沸,水面通红,至宵分始散”。

对于北塘香灯,明代王永积在他的《锡山景物略》中有着详尽生动的描述,并称“他邑未有也”。因为过了无锡之后,运河再也没有蓉湖这样宽阔的水域,这样的场面便不复出现了。

秦琦那一天放舟赏灯,自次日凌晨始才尽兴回家。日后,他在《惠山竹枝词一百首》中对当日情形多有描述。更为有趣的是,这些诗多以少女的口吻写就。诗中有云:“一带清溪落涧声,歌船酒舫遍纵横。行人两岸纷如织,都为萧娘作送迎。”“日午山头霁色开,游船多自北塘来。心知宝善桥边近,再把云鬓整几回。”“船头侍女髻梳双,频递新茶捧玉缸。报道山前香会近,美人纤手拓纱窗。”“游山画舫泊河塘,簾簾湘帘四面张。不待小舟能送酒,调羹妙手爱船娘。”“春宵处处起吴讴,月色灯光上绮楼。料得夜游人未散,三更犹是卷帘钩。”“溪桥争渡晚匆匆,并著船窗笑语通。归路不愁纤月落,北塘灯火照人红。”